

时间的河流奔涌向前,那些与文字相遇的瞬间,总会在记忆中留下印记。本期“新力量”专刊邀请8位青年作家,分享他们过去一年属于自己的“文学时刻”。在这些时刻中,有对现实的凝视、对心灵的叩问,也有对生命和世界的细微洞察,对生活馈赠的真诚回应。希望这些鲜活的分享,能让读者看见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结,感受到属于青年写作的温度和力量。

——编者

## 亲密的“我们”

上飞机时,相邻的两个座位坐着一位女性和一位老人,大概是父女。猜想得到了验证:她帮老人要了毛毯,让他起飞前先喝好水,保温杯放到她座位前的网兜里。起飞后的颠簸中,两个人谈天,用一种节奏快、听起来有催促感的方言;在多少种语言里,“妈”这个字的读音听起来都差不多。空乘推着餐车过来,女性说:“我们,两个鸡内面吧。”我想起以前见过类似的时刻,也是在飞机上,年轻妈妈带着孩子,代孩子跟空乘要橙汁,也是说了句,“我们”。

我想起一篇由“我们”这个称谓而起的小说,雷蒙德·卡佛的短篇《肥》。故事中,走进餐馆的胖子点餐时会和服务员说,“我们”想来点烤马铃薯配酸奶油,黄油来得多多的。女招待弄翻了水,他说,没关系,“我们不介意”。小说的叙述者是女招待,她看不惯餐馆里其他人笑话他,但她在同情中也怀有惋惜:这个身躯巨大的男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,又不想“随欲而安”,于是他让这身体外在于自己,称呼它如同称呼另一个我,同时不得不接受它。无助中仍有力量,但也还是无助,清醒地随波逐流。女招待看到这些,于是,她也想成为自己了,也不想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。小说结束于她的一句声明:“现在是八月。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。我感受到了。”

之所以飞机上的那一刻有文学性,不是因为生活与经典短篇作品的偶然暗合,而恰恰是因为生活展示出与经典短篇相反的面貌——卡佛的观察者兼叙述者在“我们”中感受到

## 烧砖与写作

南京毕竟是古都,时不时就能看到一些古建筑。说是古建,其实大多也才刚过百年,只悄悄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古早味儿,与这座城市早先经历的诸多历史磨难比,并不显得沉重。

我这次来南京,是受邀参加一个文学笔会。与会的都是年轻作家,虽然年轻,但创作成绩不俗,恰如那些未经太多沧桑的古建筑,刚刚有了底蕴。年轻人聊文学,少了拘束,自由发挥,观点新颖,对错已经不是标尺,有质地的声音总是让人回味无穷。聆听朋友们的发言,突然就觉得自己浅薄了,以诸君为镜,我不断审视自己的创作,有令人灰心丧气的心思,也有让人血脉偾张的期待。

主办方安排周到,笔会的最后一日,带领我们参观城墙博物馆。算是故地重游了——六年前,我与妻子第一次来南京游玩,曾到过中华门城墙下。当时仅仅是路过,并未对那些明代城砖产生一点儿兴趣。那时我们刚刚组建起新家庭,恋爱时为了解彼此留下好印象刻意隐藏起来的部分,因婚姻的落地而逐渐浮现。因为一些芝麻绿豆的事,我们时而争吵又不断修复,在一次次磨合中渐渐相互忍让、理解和包容。那次南京之旅,儿子已在妻子腹

## 祝你生活顺利

年初的时候,朋友给我送来一棵朱顶红,寓意吉祥,代表祝福,我欣然收下,放置在明媚的阳台一角。阳台上有着春羽、箭竹、太阳神、朱顶红坐在木茶几正中。那段时间,或许是因为心理作用,也或许是刚好凑巧,生活中确实有几件好事连连发生。开春之后,温度适宜,类似洋葱的圆体渐渐发芽,明明没有香气,家中小狗却喜欢凑到朱顶红边上轻嗅。那段时间刚好在创作新长篇,因为这是第一次挑战新的题材,既兴奋又忐忑。我有写累了唱歌的习惯,之前都是站在阳台对着窗外唱,朱顶红成了聆听我胡乱唱歌的对象。大概是歌声并没有让它厌恶,或许它也是个音痴,我没想过一棵植物,不浇水不施肥,也可以自由成长。植物长势很好,生叶开花,不止一朵,我拍了照发给朋友,朋友说,花开两朵各表一枝,说明好事成双。

我喜欢总是说好话的朋友,过了三十岁,就特别需要这样的声音,但是花开花败,都是自然现象,没多久,开的花就掉落了,叶子也黄败了,圆体最终又变成了圆体。那时初夏已经悄然到来,我不清楚枯谢的朱顶红应该怎么处理,毕竟它是一种“福气”,朋友说,你就正常扔掉,然后对它说一声“谢谢”就好。我担心随意丢弃是一种不尊重,便将其放在楼道的垃圾桶边上,没有扔进去,最终双手合十表示感谢。

这件事原本已经结束,之后又是正常生活。我的歌声突然没有了聆听的对象,我又开始对着窗外路人乱唱。小狗也不去阳台了,好像它也知道朱顶红消失了。

整个夏天,我都在写长篇,但总有琐事缠身,故事推进极为缓慢,好几次都卡得无法进行。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,有一天,我领小狗下楼散步,遇到一个新搬来的邻居,正在卸家具,他对我很热情地打了招呼,然后说他也有只小狗,有空可以一起玩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热情的邻居,走的时候,他和我说了,生活顺利,我也对他说了一样的话,但是那天回家,我正在写小说的时候,突然停了电,电脑里的文档还没来得及及保存。心里一咯噔,匆匆充值了电费,但断电后要推闸门,我就去楼道间开闸,弄好准备放梯子的时候,突然看到楼道的窗户边上,有个乍眼的红色圆球,走过去才发现是那棵朱顶红又生了新的叶子,而且长势凶猛。我听到室内来电的声音,急着回去看文档,发现不仅文档在,在看到那句写不下去的话时,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思路。

那棵朱顶红至今还在楼道间里,安静地生长着,我不知道是不是保洁在清理垃圾的时候,也意识到这是一棵不应该丢弃的生命,将它放置在楼道间的窗台上。我想起新来邻居和我说的那句生活顺利,突然感到温暖而充满活力。

■ 淡 豹

了同情与恐怖,不愿意再像胖子那样,被迫接受内在于自身的他者。而我,邻座的小小观察者,从那两次“我们”中,感受到的是联结的自然。人自自然地与亲密的他人组成“我们”,当妈妈代孩子说话,这里没有什么“丧失主体性”的问题,没有女招待所恐惧的自我消弭,不涉及谁能够代表谁发言的那些危机。生活冲概念轻轻笑了一笑,或者说,这神圣的生活,越过了概念。生活能够持续,是因为孩子可能羞怯也可能谨慎,可能不想跟陌生人说话,妈妈可以代劳。生活能够持续,是因为女儿照顾着父亲,以相邻、以普通话、以对旅程的知识。生活能够持续,不是因为凡选择都必须由个体亲自去做所赋予的流程正当性,而是因为共同生活的事实形成了习惯,并且人们在习惯中有可能相互爱憎。

什么是文学时刻呢?布迪厄喜欢谈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,他认为人可以用社会学的直觉记录下“快照”式的社会瞬间画面,以供未来发展并利用。“社会学家的工作与作家或小说家(这里,我特别想到了普鲁斯特的作品)的工作颇为类似:与后者一样,我们的任务也是为人们提供进入各种经验的途径,并且向大家阐述这些经验,不论这些经验是普遍共享的,还是少数人特有的,只要它们在平常是被忽视或者未经整理的,我们的工作就有它的价值。”恰恰因为那些“主体性丧失”的经验今天被谈得很多,所以,我想记录下这相反的时刻,希望它能像快照,呈示那相互联结的生活。

■ 刘星元

中五六个月了,我和妻子珍视着他,如同珍视自己此生最好的作品。因为他,妻子时不时就要休息一会儿,让这段旅途显得疲惫而幸福,以至于我对此后的数次南京之行都存在好感。

南京城墙博物馆内陈列着的数百块城砖,砖面均刻有提调官、司吏、总甲、甲首、小甲、窑匠、造砖人夫的名字,这些名字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侵蚀,大多依然清晰。六百年了,他们顶着皇命,仍旧还得对自己督造或烧制的城砖负责。馆内展示了城砖制作的完整流程,择土暖水、练泥压泥、制坯阴干、装窑烧密、窑水开窑,唯有经历这一整套繁琐工序,才能造就一块合格的好砖。与那些刚过百年的建筑比,这些城砖是更为久远的古物,它们如一部部从历史深处穿越而来的旧书,生命持久且厚重。隔着玻璃,我用目光抚摸一块块砖石,抚摸砖石上的一个个名字,我知道,每一块砖石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鲜活的生活,被历史遮蔽,又被历史铭记。

烧砖是一项技艺,写作亦是一项技艺。2025年的某个冬日,在南京城墙博物馆,俗套的喻象突然让我如此心动,我暗暗告诫自己,要烧好每一块砖。

## 夜 车

2025年在欧洲赶上声势浩大的罢工,原定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航班突然取消。为了不耽误后面的行程,我只能凌晨离开机场,辗转到客运站乘坐大巴车去罗马。虽说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,但这个个通法实在出乎预料,更意外的是客运站站台,深重的夜幕下竟然到处是人,有的还没来得及及换下度假的装束,想必都是从机场颠沛至此的旅客。过了许久,巴士驶进,众人入座,车里攒动不同发色的脑袋,身边响起嘈杂纷乱的语言,有些尚能分辨种类,有些则连来自哪块大陆都不得而知。最终引擎轰鸣,覆盖全部声响,所有人缩紧身体不再说话,车身深入黑暗,颠簸仿佛方舟。

我眼前混沌,姿势扭曲又难以入睡,只好翻看新闻来对

## 留 白

前年十月,我家附近一处历史悠久的废弃仓库翻新改造,变成了一座小公园。改造之前,我出门遛弯儿,常会路过这里,但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仓库,只知道是个储油的地方——围墙里边矗立着一个又一个硕大的废弃油罐,表面斑斑驳驳,看上去颇为神秘。

我发现公园开放实属偶然——那天和父母散步,路过此处,无意间发现油罐前方的围墙上竟开了一扇门。询问门卫,才得知这里新开了一个公园。由于入口处与那些油罐尚有一段距离,我当时并未想到这公园与那些油罐有什么关联。油罐在公园一侧,其间设置有步道,供游客漫步;另一侧是个小广场,中央立着一棵高大的树,旁边有个供孩子玩耍的沙坑,再往外则是篮球场、洗手间、临运河的步道等。整个公园不大,绕一圈用不了十分钟,自开放后,就成了我们一家三口遛弯儿放松的绝佳去处。

我们坐在长椅上,头顶是遮阳的廊架,目力所及之处,基本能覆盖大半个广场。不过大多数时候是父母来。他们退休在家,若遇上好天气,便会踱步到此,消磨一段时光;而到了寒假,我也加入其中。父母会带上一个小袋子,里面装着纸巾、零食和一个盛咖啡的保温壶,咖啡喝完了,就去长椅后面的直饮水机接热水。我们一般都是坐半个多小时,晒晒太阳,聊聊天,刷刷手机,看小孩子玩耍;返程的时候路过超市,有时会买几挂香蕉。

## 这一年,这一刻,与文学有关

## 看了又看

原本不对旅行抱太大的预期,我去的只是一座寻常城市。

城内里,一街新,一街旧,相隔一道水。新街不算新,就是在每座旅游城市都会看到的那条商业街,便利又熟悉。这样的街是个敬业coser(角色扮演者),每到一座城,换一点外在装饰,但内里,人还是那个人。他对你招手,想帮你解决吃喝住的问题,纪念品也顺手拿一些,“不白来嘛都不白来”。

与此平行的是条老街,新旧两街拖着两簇细长的白墙黑瓦建筑群,夹一条不算宽的古运河。夜里,红灯笼都亮了,人都来了,河里有电动船,扑簌簌地窜。似乎靠近现代的色彩和声响都更闹腾,根子上是不甘寂寞,总要抓人作伴。

走石桥,到老街,同样布满店铺,却是二十年前的样子。有塑料玩具塞得密密匝匝的店,沿街的展示玩具在地上转圈,发出电子音,被太阳晒得发白。有人坐在竹凳上卖水果,用墨绿树叶垫底,果实水亮,旁边用白纸片写着,“红心芭乐,软糯香甜”“树熟释迦,很香很好吃”。也有人摆

■ 陈萨日娜

抗黑夜,无意间刷到一个“大连网红打卡地”的总结。在一众山林、码头、海岸线之中,我惊讶地看到了四岁时我家住过的房子——独门院子的一栋两层小楼。那时爸爸是个小干事,单位分房子只能得到这座没人要的矮楼,因是20世纪初期日本人盖的,所以叫作“日本楼”。从外面看,房子是三棱柱形状,朝向奇怪,像岔路口上扔了一块切分下来的蛋糕。内部也同样破败,墙木酥烂,除了我家,还住着白蚁,父母为此闷闷不乐。还好这栋老房子始终是一座私密的乐园,把舍不得吃的糖果埋在院子里种下,跟成串的蚂蚁说话,坐在二楼窗台数外面飘下的叶子,都是我喜欢的东西,甚至连那怪异粗糙的楼体,在我眼里都是童话的还原。如今在屏幕里,它还是杵在拐角,不知哪一任住户做了翻新,

■ 吴清缘

寒假过后,开学、上班,几个月里都没工夫再去。一直到放暑假,我才又去了小公园。独自坐在长椅上,我不免想起冬天一家三口坐在这里的样子,顺带回顾一番自己度过了怎样忙碌的一个学期。暑假过后,新学期开始,我又很少来了。十一月时值深秋,我配眼镜回家,故意多坐一站,到复兴岛转悠一会儿,回程时再次来到小公园,坐了约摸二十分钟,回忆我冬天和夏天坐那儿的时候——而那棵大树的叶子快掉光了。

但我还记得夏天的时候,它是怎样的枝繁叶茂。我又是怎样盯着那些叶子,怔怔地发呆。最近两三年特别忙碌,我又总爱计较自己有没有浪费时间,唯独在小公园的时光,是我为数不多不去计较的时候。想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总爱坐在小公园里回顾过往——那段时间是我忙碌生活中少有的放空时刻,就像画里的留白。于是,它们便成了我过去一年里的线索,断断续续地串联起那些埋头赶路的日子。坐在小公园里的时候,也许就是我这一年最文学的时刻:我只是坐在那儿,什么都没发生,但却充满意义。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岁末年终,转眼又将迎来寒假。我还会来坐坐,和父母一起,看着那棵光秃秃了有好一阵子的树。

然后我也许会想:再过几个月,它又会绿的。

往往是在完成一部作品后,我会陷入更深的忧虑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对写作都没有信心。我不知道在今天这个传媒爆炸的时代,还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阅读文学作品,更何况是像我这样不知名作者的作品。

2025年,我写了一篇关于教育的小说《先生》。我塑造了一个在世俗意义上失败的老师,他认真教书、待人和蔼,却因带班成绩不佳而被领导和学生嫌弃。小说最后,临近退休的老师带着妻子亲手酿造的青梅酒去找昔日学生,却被放了鸽子。在漫长的等待中,他不小心打碎了酒瓶,他将那些平常舍不得吃的青梅轻轻捡起,放入口中,青梅酒“清冽着,热辣着,却带着几许甘甜”,仿佛人生的况味。小说完成后,我第一时间发给汤成难老师,她提出了宝贵意见,还帮我进行了修改,我很感激。

之后,我参加了《人民文学》的“人民阅卷”漯河行活动。那天来的人很多,我发现很多人手里都拿着我的小说文本,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。我很意外,也很感动。讨论很快开始了,有人说小说关注了教育的问题,有人说它体现了对人生困境的观照。大家各抒己见,场面很热闹。引发高潮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读者,她站起来动情地说:“金老师,在您的作品中,我读到了一种悲悯。人的一生,很多时候努力不一定有回报,因此每个人都需要与自己的内心和解,谢谢你给予余老师的那一丝甘甜。我想,好的文学应该关注普遍的人性,永远给人向上的力量。”她的话引发了在场很多人的共鸣,就连我这个作者也动情地跟着鼓起了掌。

分享会结束后,很多孩子跑过来将我围住,让我在他们的衣服上签名,我很惊讶。在征得现场家长的同意后,我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一瞬间,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:多好的读者啊。文学仍是我的不懈追求。我希望自己越写越好,希望文学能够给更多人带来慰藉。

■ 巢万莹

个木牌,坐河边卖茶叶蛋,小卤锅滚煮着,茶叶与马赛克裂纹的鸡蛋在棕色的卤水里跳。我在旅游区长大,这一切更靠近童年所见,像在异乡遇到一位老邻居。在新地方走,却看见旧时风光,原是借助这些我不曾用心记住的事物。

走累,坐在渡口石阶上,建筑与建筑的间隙很像电视机,正播放一段街道切片。路的豁口里,有行人提着各样的物件,低头缓缓走过去。再到下一个渡口,对面灌满霓虹灯的新潮市集,鲜亮的蓝粉光都泼出来,在倒影里稀碎。

那一周,我发现自己反复来到那里,强迫症似的,每天都要到街上走两三遍。初看时只觉寻常,可一次次返身去看,就在重复里产生了意义,与这陌生地方产生了情谊。情谊在,那些过往与现时思虑就放心地走出来,与我相见。这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新发现。我才想起,过去也因为在一瞬被慢住,就反反复复地去同一座艺术馆,站在同一幅画前,走也走不动。我看它,它也看我,彼此就熟了。无声中,交流了太多。

而写作有时也如此。虚空中反复捋摸,门就开了。

它的外墙不再是裸露的砖石,披上了当下流行的清水混凝土,俨然是个精致的现代建筑,围观拍照的人们不会看得出它,俨然过百岁、历史复杂,20世纪90年代时曾经庇佑过一个小孩。

我放下手机,周围已渐起鼾声,来自远方的人们疲于周游,短暂地闭上眼睛,待恢复体力,再奔赴下一个别人待够的地方,去参观别人的故事。可是时间从来就不是一条单向的河流,我们互为过客,彼此打量。

而我此刻,于数年之后,万里之外与自己的历史不期而遇,实在是奇妙的巧合。倘若写进小说,恐怕故作,但作为一个具有文学性的时刻拿出分享,我想它无可挑剔。

## 面向温暖的生

■ 许晓敏

2025年冬,我来到汶川萝卜寨,海拔约两千米。穿过一片樱桃树林,萝卜寨的旧址在山腰处延伸出去的台地,那黄泥和石头垒成的房子在地震时垮塌了,还包括一座东岳庙,皆作断壁残垣。走到最末端往下看,岷江在谷底蜿蜒,城市那拥挤一团的冷硬建筑、大山的枯寂、风的荒凉,更衬得江水的蓝绿令人心惊。往前看是雪宝顶,覆着一层薄薄的积雪;往后看也是大山,长满了桦树、青冈树、野白杨,树林隐身在棕黄的色彩下,好像某种动物的皮毛。

羌族释比的“盖卦”仪式从下午开始,在年轻释比的家里,协助和见证仪式的是从茂县、理县等地赶来的老释比。他们试图向我们解释,这不是一个出师仪式。所有的释比都有一个共同祖师爷阿爸木拉,这个释比要通过考核,最后跟学校颁发学历证书一样,才成为一名正式的释比。

人潮汹涌,人们手里握着手机、相机。屋子里弥漫的气味是我熟悉的:香、黄表纸、松树枝焚烧的气味,呛鼻熏眼。羌族的经文从老释比嘴里喃喃道出,门口间或响起高亢苍凉的唢呐声。我站在门外,高原上的阳光不像是阳光,倒像光燃烧的灰烬,热烈、通透,尘灰飞扬。直到深夜莅临,人流散去,释比们在旧址的一处荒地,围着燃烧的篝火,敲着羊皮鼓,轮流唱念经文。这些年来,我想要抓住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就来了。彼时星空压迫,一颗流星突然闪过,资历最高的老释比戴着一顶猴皮帽,唱至动情处,突然躲到鼓后恸哭。白日里可见的已不可见,只剩下剪影或轮廓,而不可见的渐渐可见,我们面向温暖的生。

脑海关于地震的记忆纷涌。那些已经离开生命,应该也会得到安慰吧。

文学仍是我的不懈追求

■ 金 晖